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

■ 林毅夫/著

发展战略 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120.4

17

200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 林毅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林毅夫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7-301-07752-1

I. 发… II. 林… III. 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IV. F120.4-53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080 号

书 名: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著作责任者: 林毅夫 著

责任编辑: 张 燕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752-1/F·09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78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



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年前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6位增加到现在的24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10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作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10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这次,借10周年庆祝之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整理、汇编成册,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领导汇报这10年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10年只是一瞬;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10年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10年前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4年9月

前言

回溯 160 多年前,鸦片战争炮声既起,悠久的古代中华文明辉煌不再,百年屈辱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放眼今朝,改革开放号角正劲,炎黄子孙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旷古奇迹:一个伟大文明由盛而衰、由衰再兴的奇迹。自 1978 年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改善了资源在产业和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GDP 和人均 GDP 分别以年均 9.3% 和 8.1% 的速度保持了 25 年的增长,而且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很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和世界经济史当中任何经济体的发展绩效相比,尤其是和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绩效相比,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以如此之高的速度保持如此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绩效是怎么称颂也不为过的。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围绕中国经验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我本人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回国进行经济学研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时时鞭策我辈努力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也为中国的经济学人提供了他人难以比拟的研究土壤。1980 年末以来,我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发展经济学杂志》、《美国农业经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汇编在《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以及《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两本书中,在国内出版。尔后我和蔡昉教授以及李周教授合作,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重点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些研究的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增订版,以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这两本书还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韩文版、俄文版等多种版本。

除上面提到的这些论文和著作以外,我还始终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坚持用严格的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并撰写

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国外的经济学期刊,有的是在一些研讨会上的演讲,有的是研究简报。为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这些观点,承蒙有关杂志社同意,我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以期引起对这些问题的更多的社会关注,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表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内在的联系。只有把握住这些联系,对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各种问题的分析和认识才能够到位。多年来,我自己正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内认识和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为了介绍各篇文章的观点,首先介绍我一以贯之的逻辑框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和政府发展战略。

一、我的发展观

既能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根据我在一项研究中收集的资料,世界 105 个国家和地区按照 1999 年的人均 GNP 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 高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2) 低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3) 低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都属于后两者之一。^①

理解经济绩效的差距,关键是理解各国政府所奉行的长期发展战略。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来就是举足轻重的。正如巴罗和撒拉伊马丁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影响长期增长率,政府的行动可对前面我们强调的生活水准造成重大后果。作为推论,政府政策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乃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优先领域。”^②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少、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各国(各地区)奉行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由这些战略所内生决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那里找到原因。

① 参见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 2 卷第 2 期,2003 年。

② 巴罗、撒拉伊马丁著,何晖、刘明兴译:《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20 世纪的人类经济史,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经济史,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能清楚地说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 世纪初处于领先地位的阿根廷、乌拉圭等一些南美国家,到 20 世纪末期辉煌不再;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到现在则跃居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而发展起点和东亚经济体大致相当,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的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绩效平平、未建殊功。

多年的研究和观察,坚定了我的发展观: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经济体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确立适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才能够使国民经济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增长,才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的利益。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和蔡昉教授以及李周教授合作,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增订版中,以一个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给出了一个内生的解释。按照我们的观点,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赶超战略,内在地要求形成一套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价格体系、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进而使得技术效率低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导出的必然的逻辑推论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入手点,是放弃赶超战略,确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始终顺应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决定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之下,相应改革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另外,由于放弃赶超战略、建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是朝夕之功,所以,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1999 年我和谭国富教授合作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论文,后来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1999 年 5 月号上。在该论文中,我们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2001 年 5 月我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为题,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了“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的首讲。后来该演讲整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上。在该演讲中我正式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核心,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基础。自生能力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



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与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相类似,自生能力概念强调了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中被广为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大量旨在实现进口替代和技术赶超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说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忽略自生能力问题还不至于造成多大误导的话,在分析发展中经济时忽略自生能力问题,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为快速追赶发达经济,建立了许多资本密集度超越于自身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由于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因而就没有竞争能力。这种状况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为此我曾经在《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一文^①中大声疾呼:“千改革、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是第一条。”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是解决我国改革诸多深层次问题的第一位的必要条件。

归结起来,我认为,任何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都内生决定于从长期来看会变动,但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是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任何经济体都必须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原则确立其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惟其如此,整个经济体中的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体的资本才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提升,技术才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得到改进,人民才能够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就是我赖以分析各种问题的发展观。我自己以及我指导的学生围绕根据这个逻辑框架归纳出来的各种可检验的命题进行的实证工作都表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和国际国内的经验事实相容。^②

本书第二个专题“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中收录的三篇文章《要素禀

① 刊登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② 具体可以参见:

(i)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

(ii) 林毅夫等:“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iii) 林毅夫等:“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2003年。

(iv) 林毅夫等:“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v) 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vi) 刘明兴:《比较优势、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vii) 李永军:《我国外商投资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viii) 章奇:《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金融结构:国际经验与实证分析》,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对我的上述发展观的详细阐述。

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这个基本框架内,我还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侧面分别探讨了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文章收在本书的第三个专题“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中。本书的其他几个专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这些讨论都是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写于1998年,主要讨论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尤其是21世纪的前20—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就增长潜力而言,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增长的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高风险、高资本投入和低成功率;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必须自己研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其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成本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等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近40年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也维持了近40年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发展道路。考虑到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大于日本在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中国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潜力,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当然,要使经济增长的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问题,譬如经济波动、金融体系的安全隐患、国有企业效率低



下、地区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三农”问题等。克服这些问题的关键入手点,是改变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立适当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是我为2002年5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亚洲发展银行“亚洲·2015”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快速发展前景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会对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成本、进出口贸易等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任何威胁,相反会有力地推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

三、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这个专题的六篇文章是对我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补充,分别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因素入手,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主要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而技术创新不等同于发明,创新侧重于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与生产者现在实际采用的技术相比较,而不是与世界总体的技术水平作比较。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从而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并引进适宜技术,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一些资本密集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产业区段,则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积累率,更快地提升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引进技术不仅不会永远落后,而且会推动整个经济的总体产业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当然,引进技术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主研发,在国防安全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退出的产业中的技术进步,都需要发展中国家进行自主研发;同时,引进的技术也需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制度至上的观点则是不可取的。文章《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批评了这种观点。作为制度至上论的一个代表,杨小凯教授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

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相对困难。他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后发国家具有“后发劣势”,要克服“后发劣势”,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再来进行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在杨小凯、Jeffrey Sachs 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现在改革很成功,尽管俄国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是由于中国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 19 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为何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①然而,印度、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证表明,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另外,日本发动二战的原因在于其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出现金融危机是由日本经济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苏联经济增长由快变慢是因为其推行了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赶超战略;具有“最先进的宪政体制”的英国现在也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内生的,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任何时空条件的最优制度结构,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的生产方式内在决定了最适合的制度结构;并且,制度结构是复杂的,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二者之间相互制约,因此,制度变迁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即使我们接受宪政改革必须先行才能保证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观点,共和宪政体制也不会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更迭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因此,只能是一面利用和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一面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俄罗斯“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绩效差异一目了然。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这种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其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

^①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 此文可从 <http://www.aeconf.net/nov2000.htm> 上下载。



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出现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日本经济的腾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自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为“后发优势”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作为一个企盼中华文明早日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学者,我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论著中惟一的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文章。五四以后,不仅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批评儒家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而且凡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样对儒家文化有很多抱怨,但二战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振兴,有人又将其归功于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岂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物层次,即国家、社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第二是组织层次,即如何组织和协调社会里面的个人,让他们共同生活、互动。它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第三是价值观念的层次,人的行为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好坏之间,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反思和艰难的现代化努力。那么,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这三个层次的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马克思则认为,器物层次的文化即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组织、价值观念层次的文化即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相应变化,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则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倾向于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对落后国家而言,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其二,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上层建筑有没有能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不断被赋予新生命、新内容的问题。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儒家哲学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的学者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使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调整,从而使得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能够一致。展望 21 世纪,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如果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就能够利用与发达国家的

经济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继续保持 20—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会随之复兴。

“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命题是经济发展理论无法回避的,我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一文中提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可能将产权明确划分到个人,并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所有者对产权稳定的预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促进产品和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推进技术进步。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分析的是与老龄化社会有关的人口政策问题。人口政策包括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两个方面。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的质量和和工作能力,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人口数量方面,我认为应该重新评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因为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是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各国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但人口生育率上升一点,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

四、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2001 年末中国正式加入 WTO,这是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入 WTO 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何趋利避害,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挑战与机遇》与《应该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两篇文章给出了我的回答。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加入 WTO 将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为了阐述我的观点,首先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但是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以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产

业,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而阻碍了出口。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出口利润也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政策支持。这样国家的外汇储备会非常有限,甚至积累很多外债,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这样一个认识基点出发,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分析加入 WTO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农业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将近 70% 的发展中国家,加入 WTO 对中国不具比较优势的粮食这种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由于有进口配额的保护,影响不大。重要的是如何让劳动力密集的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养殖品、农产品加工品等,充分利用加入 WTO 带来的空前的发展机遇。所以, WTO 对我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适应新的形势,快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同时,除了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之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在制造业方面,不少人士认为,加入 WTO 之后我国的企业将面临国际大集团、大公司的激烈竞争,要使我国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大集团和大公司。但是我认为,加入 WTO 之后受冲击最大的制造业行业,恰恰是那些资金高度密集的行业,譬如汽车行业和电信行业。这些行业违背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没有自生能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依靠国家采取的高关税、限制市场进入等多种扶持手段生存。加入 WTO 之后这些保护措施将渐次取消,这些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将面临挑战。但是加入 WTO 会促进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因此,为了利用加入 WTO 的机遇,应对加入 WTO 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快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首先,对于业已建立的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如果产品容量很大,可以用市场换资本的办法,吸引外国资本,以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竞争力;如果产品市场前景看淡,那么就应该转向劳动密集产业。其次,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吸收农业和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降低 WTO 对农业的冲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加入 WTO 也将对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应对不当将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资金实力、服务网络、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工具和产品种类等方面,都具有国内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加入 WTO 对我国金融业最大的潜在影响是,有可能出现国内金融机构业务向外资机构的大转移。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内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样的潜在影响,必须利用金融业完全开放之前的缓冲期,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适当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信水平,从而尽可能避免出现金融业务大转移的局面。

总之,加入 WTO 既为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我国政府将越来越难于用政府的政策来支持、保护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因此,分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要求我国政府转变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本国经济,进一步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透明的法律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

对外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传统的经验估计方法低估了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贸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文提出,应该分别考虑出口和进口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并考虑出口的直接贡献和出口增长刺激消费和投资活动而形成的间接贡献,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我们将“外贸贡献率”定义为“净出口的贡献率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间接贡献率”,并设立了包括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四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90 年代各个年度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接近 0.1,即出口每增长 10% 基本上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 个百分点。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农民与消费者的影响》讨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亚太地区农民和消费者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是世界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地区,粮食需求量十分巨大。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弥补绿色革命的不足,极大地改变本地区食物供需形势,增加本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对该地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但是,生物技术开发对科研能力和资金投入要求很高,亚太地区的一些落后国家自主开发能力不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容易导致没有掌握先进生物技术的农民丧失市



场机会,作为消费者得到的福利增进不足以弥补作为生产者遭受的福利损失。同时,要使农民能够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成果,需要一定的融资条件。总之,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亚太地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五、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发展模式是否已经过时?如何确定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发展》三篇文章旨在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并不会改变一个国家应该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重要特点是技术变迁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快。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只要传统产业能够利用知识经济所提供的先进信息技术来加强内部管理,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知识经济其实为传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我国企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提供了机会。就信息产业本身在我国的发展定位来说,软件的研究开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而人力资本的差距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加强教育来消除,因此,软件业的兴起使得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中文运用软件上,取得超过发达国家的成就;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如芯片的开发,另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如产品组装,我国仍应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从劳动密集的生产做起,逐步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一文中,就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四点建议:普及信息技术;改善学科设置,我国大学应将基础教育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学生不能只学本专业知识,应重点掌握学习新知识的本领;加强科教结合,促进科研向重点大学转移,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使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使我国高校像国外大学那样处于知识创新的最前沿;积极引进国